

宋代的江西刻书

杨 晏 平

关于宋代的江西刻书，历代书目及地方史志有记载，不少论述宋代雕版印书的专著也多所涉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又有清康熙间文行远撰《浔阳臬醢》一书的典籍部分详细记述了宋代江西九江、庐山地区的刻书、藏书情况。而早在南宋初年尤袤编撰《遂初堂书目》即有京本、监本、杭本、江西本之分。凡此种种，表明江西刻书不仅起于南宋以前，而且在宋代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宋代江西刻书的社会历史背景

1. 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

江西在宋代称江南西路，除饶州、信州和南康军属江南东路外，管辖范围大致与今天相同。因处于内地，很少受战乱影响。尤其是南宋以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地处长江中游，具有优越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江西，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南朝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江西人口仅4万6千余户，33万余口，到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就增至200万余户，445万余口。江西进入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新时期。《宋史·地理志》记载：“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焉……。”据《梦溪笔谈》卷十二、《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宋代每年从东南六路漕

运粮食总定额为600万石，其中江南西路在北宋时为120万8千9百石，占1/5多，到南宋时增至200万石，居三之一。故曾巩在《元丰类稿》卷十九《洪州东门记》一篇中描述：“其田宜秔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江西做为当时主要的粮食基地，在整个宋代国计民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江西的商业、手工业、冶炼、造船等各行各业都有了极大发展，并在很多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这些无疑都为其雕版印刷事业的进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其中发达的造纸业，则为雕印书籍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江西之地，遍生桑、楮、竹子等，可做为重要的造纸原料，就地取材，十分方便。宋代江西很多州县都盛产纸张，见诸文字记载的就有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算钞纸（亦称摔纸），清江的藤纸，吉州的竹纸，临川的滑薄纸，九江的云蓝纸，南康军的布水纸等等。其中抚州更是宋代七大造纸中心之一，所产算钞纸十分有名。雍正《江西通志》记载：“宋人墨刻用摔纸者为贵，今绝无矣。”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亦云：“南宋时则以抚州算钞纸为有名。”又记廖群玉《九经》本最佳，其“选纸之精，独重抚州算钞，可见此纸之胜于他产。”此外，我国东南地区又是宋代主要的笔、墨产地，纸、墨、笔于刻版印书缺一不可，江西地处其间。如上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该地区雕版印刷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2. 文化教育发达，名人学者荟萃

江西自古以来就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进入宋代以后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发达。宋初统治者以武力夺取天下之后，更感到巩固政权，终须“以文为治”，于是注重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社会各界精心学术，崇尚文化，由此也对雕版刻书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措施之一是对唐以来所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破除门阀限制，更广泛地面向中下层知识分子，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这些人求学上进、读书应考

的热情，也促进了各级教育的进步。早在唐代江西就有了以庐山国学为标志的私人讲学机构，北宋初，作为地方最高学府的书院在江西得以形成，到南宋时更是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江西境内有书院130余所，数量居全国之首，故有“江西书院甲天下”之说。其中白鹿洞书院享誉海内，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还有象山、鹅湖、豫章等书院也都规模宏远，颇负盛名。此外，江西在宋代还开办有许多家族性的书院，诸如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建昌洪氏的雷塘书院（又称雷湖书院）、分宁黄氏的芝台书院、南昌陈氏的飞麟书院等等。书院以下，又有州、县的各级各类学校，即郡庠、郡斋、学宫、县学等，形成了遍布整个地区的教育网，也因此为更多人士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借以跻身仕途。据记载，宋代进士有姓名可考者29000人，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安徽地区达24000人，约占82%。又据雍正《江西通志》人物卷，宋代江西仅临江、吉安、抚州三府即有进士199人。当时，发展教育，科举取士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这就必然要印制大量有关典籍来满足需求。钱存训先生在《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曾列举一系列数字，得出“各地进士名额和印书数量的多寡成正比例”的结论。可见，科举制度的变革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也为雕版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了雕印书籍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众多的名人学者，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理学家、教育家朱熹、陆九渊，江西诗派创始人、书法家黄庭坚等都与江西有着渊源关系。另据有人统计，在南宋的62名宰相中，浙江20人，江西、福建合18人。又江西有词人78位，仅次于浙江，故洪迈称：“七闽、二浙与江西东……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文人蔚起，人才荟萃，为江西文化史留下了光辉一页，他们所创造的难以计数的文化典籍有

力地推动了江西刻书事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又赖雕版印刷得以播传。

江西雕印刻书事业繁荣兴盛的直接原因还在于宋代统治者对刻印书籍的大力提倡，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宋朝以文为治，而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两宋君主不仅多方购求图书，对编刻书籍有功者，更是赏以金帛或授以官职。鄱阳洪迈刻《万首唐人绝句》，颇得皇帝称许，因有茶香金器之赐。国家重视，各地官府自然是竭尽全力，从而也更刺激了各方人士刻印书籍的兴趣。

总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发达，为江西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与雕版印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两宋三百年间，随着雕版印书的兴盛，江西逐渐成为重要的刻书地之一，不仅具有完整系统的刻书机构，而且地域分布广泛，刻印内容丰富，并以其独特的雕印风格在我国宋代雕版印刷史上独树一帜。

二、宋代江西的刻书机构及其刻书概况

1. 宋代江西的刻书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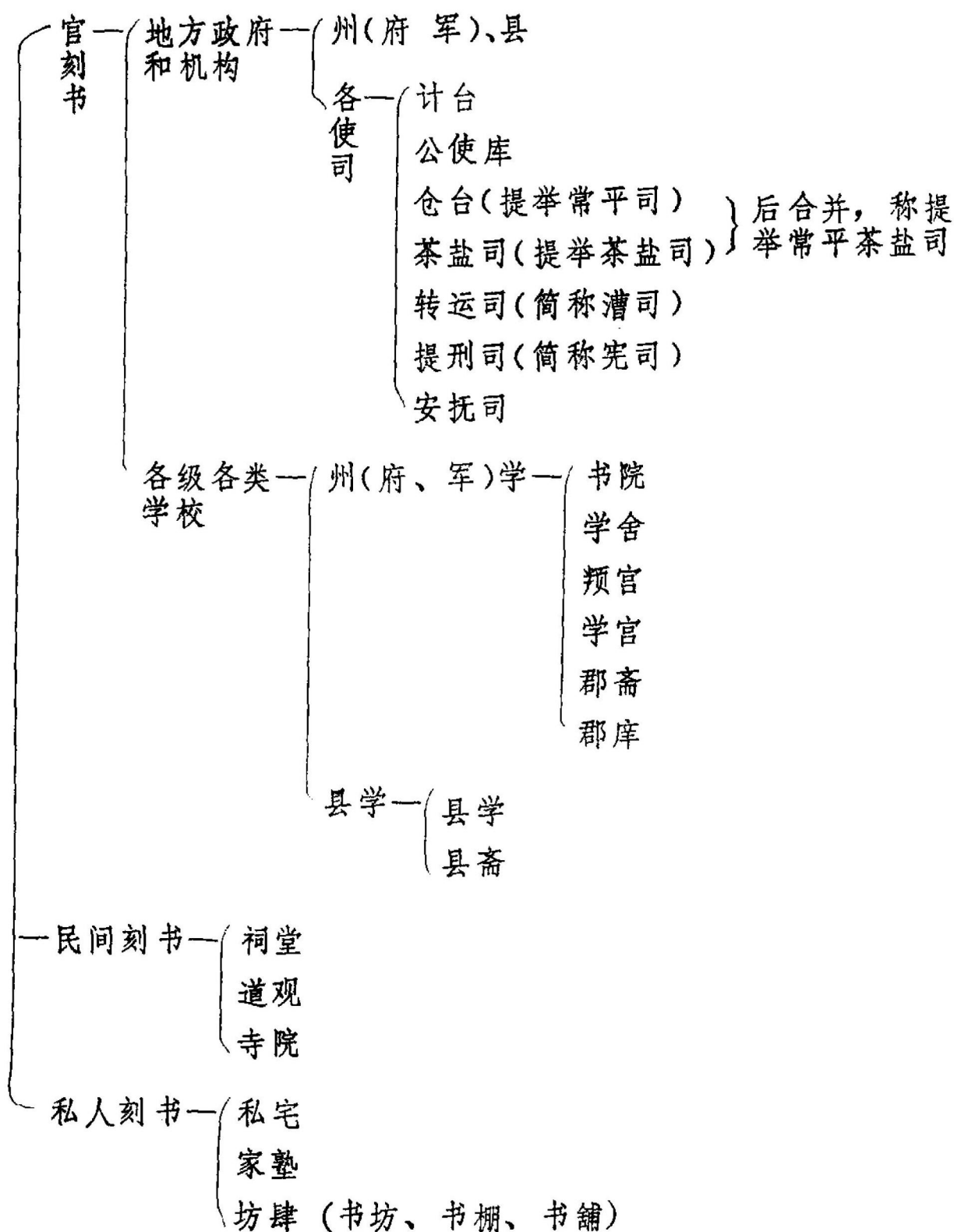
为适应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的客观需求，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江西的雕版刻书事业在规模与水平上也进入了更高阶段，先后涌现了许多刻书单位和个人，官雕私刻形成网络，遍布全省。其刻书机构略如下图：（图见下页）

以上各机构刻印了大量书籍，所刻或见诸文字记载，或有原本传世，今仅就个人知见，依上表顺序将宋代江西刻书略作考述。

2. 宋代江西的刻书概况

（1）州（府、军）、县刻书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雕版印刷事业的支持与鼓励以及中央各机



关大规模刻书的影响，全国各州、县纷纷响应，竞相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之地可考者仅30余处，其中江西就占5处，计有洪州（南昌）元丰（1078—1085）末年刻印《阙里世系》，虔州（赣州）赣县嘉祐八年（1063）印造《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

尼经》，吉州宣和四年（1122）刻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九江庐山刻《白氏文集》以及抚州临川刻王安石的《临川集》。上述地区为江西刻书发展较早的几个地区。其中在湖南郴县凤凰山宋塔中发现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反映了早在北宋中期江西南部赣州的雕印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可惜因靖康之乱，北宋刻本能流传至今者已寥寥无几。南宋以后，江西刻书得以迅速发展，各州（府、军）乃至相当一部分县都有刻书。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记述了南宋刻书地域共约183处，江西达25处之多。进而据有关书目统计，上述江西地区共刻印经、史、子、集42种，其中集部20种，几近半数。可见江西官刻书在重视经部的同时，内容已有更广泛的扩展。而就地区分布而言，则吉州、抚州所刻尤多。其间各州（府、军）、县刻书如下：

吉州刻本：

《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 （宋）杨万里撰（宋）张敬之校正 嘉定2年（1209）

《杜审言诗集》（唐）杜审言撰 乾道6年（1170）

《前汉书》（汉）班固撰

《舆地广记》（宋）欧阳忞撰

《清波杂志》（宋）周辉撰

《东坡别集》四十六卷 （宋）苏轼撰

《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六十七卷 （宋）陆游撰

抚州刻本：

《周易》十卷 （魏）王弼 （晋）韩康伯注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 （宋）徐无党注

《浪语集》（宋）薛季宣撰 宝庆年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宋）王安石辑

《侍郎葛公归愚集》（宋）葛立方撰

《象山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八卷 （宋）陆九渊撰 开禧三

年 (1207)

南康军刻本:

《古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集传集注》十四卷(宋)朱熹撰

《仪礼经传通解续集》十五卷 (宋) 朱熹撰 (宋) 黄榦

续 嘉定十五年 (1222)

《周元公年谱》

《周子通书遗文遗事》一卷 (宋) 朱熹撰

袁州刻本:

《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考异一卷附志二卷 (宋) 晁公武撰 (宋) 赵希弁考异并撰附志 淳熙九年 (1249)

《昌黎先生文集》 (唐) 韩愈撰

赣州刻本: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 (宋) 洪迈撰 嘉定五年 (1212)

《六臣注文选》 (梁) 昭明太子撰 (唐) 李善等注

饶州刻本有: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范文正公全集》 (宋) 范仲淹撰 乾道(1165—1173)间

《昌黎先生文集》 (唐) 韩愈撰

九江刻本:

《晦庵语录》四十六卷 (宋) 李道传编

《元次山文编》十卷 (唐) 元结撰

临江刻本: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宋)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 庆元 (1195—1200) 中

信州刻本:

《濡水集》 (宋) 李复撰

《稼轩词》一卷 (宋) 辛弃疾撰

南安刻本：

《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一卷外抄八卷 （唐）韩愈撰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别录一卷摭异一卷音释一卷附录一卷事迹本末一卷 （唐）柳宗元撰

其他还有江州（南昌）刻《钟鼎法帖》十卷（宋）薛尚功辑，庐陵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宋）朱熹撰，鄱阳刻《晦庵先生语录续录》、《艾轩集》九卷（宋）林光朝撰，萍乡刻《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宋）周敦颐撰，临川刻《欧阳修撰集》七卷（宋）欧阳澈撰，刘孝魁刻《后山居士集》（宋）陈师道撰，上饶刻《叠山集》五卷（宋）谢枋得撰，豫章绍熙六年刻《坡门酬唱》二十三卷（宋）邵浩编。另有刻书地不详者：北宋元丰八年刻《东家杂记》（宋）孔传编，淳熙十二年刻《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一卷（宋）唐慎微撰，《九经》，《论语意原》二卷（宋）郑汝楷撰，《五朝名臣言行录》（宋）朱熹撰。

（2）各使司刻本

宋代在全国诸路设置各类使司，负责掌管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事务。这些使司既有实权，又有资金保证，于是纷纷从事雕印书籍，其刻本依单位不同，分别称为公使库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漕司本、转运司本、仓台本、计台本等。在江西官刻本中，各使司本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公使库本为著。所谓公使库，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有如下记载：“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与边县州军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帅宪等司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热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由此可知公使库不仅要为过往公使出差提供饮食

住行之便，而且承担所需全部费用，其资金来源不管是“敛于民”，还是国家专门拨款，并无本质差别，不过是巧取豪夺，供公使们挥霍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公使库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公使库官员及客寓官吏闲暇时间又很充裕，种种优越条件，为其大量刻印书籍提供了方便。刻版印书既可附庸风雅，又不失为广开财源的一种门路。其间抚州公使库所刻“十二经”最著名。《中国版刻图录》著录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礼记》一书，摘引《黄震日抄·咸淳九年修抚州六经跋》云：“知当时刻有六经三传，至咸淳时又添《论》、《孟》、《孝经》，以足十二经之数。”所刻十二经，今传世者，《礼记》外，尚有《周易注》九卷《略例》一卷（递修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十二卷（绍熙四年重修）及《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惟此《礼记》本，傅增湘称：“为抚州原刊，无补版，初印精善。纸厚韧，墨色浓郁。行间眉端墨书，为宋人手迹，至可宝也。”“在抚本中，当推甲选。”在公使库本中，值得推崇的还有淳熙七年（1180）苏诒在筠州公使库所刻苏辙的《诗集传》二十卷，其版刻年代与地点据书后镌：“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孙朝奉大夫、权知筠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诒，重校正刊于本州公使库”刻书跋文，筠州后改称瑞州，即今江西高安县治。是书“墨色精纯，行格疏朗，完全是宋人刻书风格。”而且也是苏氏《诗集传》今传的最早版本，又是所知的海内外孤本，十分珍贵。另外，本文前面提到的北宋宣和四年（1122）《六一居士集》，实为吉州公使库所刻。

公使库以外，有安抚司，俗称“帅司”，主管军政，兼民政、司法和财政。有提刑司，又称提点刑狱司或“宪司”，主管一路的刑狱及治安事务。有转运司（即漕司、漕台）主管物资转运与财政税收。有仓司（仓台），即提举常平司，掌管一路的常平仓、广惠仓以及免税、市易与农田水利诸事务，后与茶盐司合并，

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漕、仓、宪等司又总称监司，都负有监察官吏之责。可见各使司权力之大，再加上有充裕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也都积极刻书。据有关记载与现存传本，宋代江西各使司刻书如下：

漕司本有淳熙九年（1182）刻荀悦的《申鉴》一卷，同年刻张方平的《张文定玉堂集》二十卷，淳熙十二年（1185）刻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还有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陈耆卿的《笱窗先生初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八卷。转运司本有淳熙十二年（1185）刻庆元元年（1195）重修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二十卷。

计台本，据李致忠先生考所称计台乃与漕台名异而实同。有淳熙八年（1181）刻杨倬的《荀子注》二十卷，嘉定四年（1211年）胡槻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十七卷，朱熹的《诗集》二十卷《诗序辩解》一卷。

提刑司于嘉定五年（1212）刻《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

仓司于淳熙七年（1180）刻《陆氏续集验方》。

其他还有淳熙十四年（1187）江西运副赵彦操刻赵彦端的《介庵居士文集》十卷，江西副使陈介刻文天祥的《文山集》二十一卷。

由于各使司实际掌管一路的政治、经济命脉，甚至还握有军权，可以说是人、财、物各方面条件齐备，刻起书来当然就更注重从内容到外观的完美。如上述计台的《春秋繁露》是迄今所知该书第一个最全的刻本，是书“字体端庄，力法严整。皮纸印造，墨色精纯，开本宏朗，不失官本规制。”由此可见使司本之一斑。

（3）书院及各类学校刻本

书院初建于唐代，至宋代则大规模兴起，官私书院遍布各

地。许多书院都选择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之处，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赣江的白鹭洲书院都很著名。做为地方最高学府，这些书院通过聘清名儒讲学、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等教学方式，不仅吸引了大批士子前往求学，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如曾就读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于宝祐四年（1256）科考名列榜首，高中状元，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及第的同窗士子达40人之多。书院在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中，的确功不可没。在宋代，书院刻书极为普遍。首先由于书院要适应教学需求，多自己编写刻印教材或书本以供阅读，其次书院有学田等固定的经济来源可做刻书费用，再次书院聚集了诸多文人学者，人才济济，是提高刻印质量的有力保证。书院所刻或儒家经典，或名人诗文，大多校勘精审，颇负盛名。也正因为如此，书院刻书才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清代。据记载，宋代江西书院刻本有：白鹿洞书院刻《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辑略》二卷与《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白鹭洲书院嘉定十七年（1224）刻《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九十卷志三十卷。象山书院绍定四年（1231）刻《絜斋家塾书抄》十二卷。环溪书院景定五年（1264）刻《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小儿方论》五卷与《医学真经》一卷等医书。龙溪书院淳祐八年（1248）刻《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书院以下，各州、县所设的学校，诸如州（府、军）学、学舍、黉宫、学宫、郡斋、郡庠、县学、县斋等，也都有雕版印书的经历，并且不乏传世佳本。如淳祐十年（1250）吕遇龙在上饶郡斋所刻（宋）蔡沈撰《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六卷《书传问答》一卷，为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上饶郡学历史悠久，几经修葺，吕遇龙开雕《书集传》，正值该郡学兴盛之时，故所刻“雕印精良，校勘精审，堪称佳善。”此外，所知其他学校刻本

如下：

郡斋本

九江郡斋：嘉泰四年（1204）刻淳祐十年（1250）递修《輿地广记》三十八卷，乾道六年（1170）刻《集验方》五卷及《西塘集》二十卷，还刻有《道命录》，《自警编》九卷与《剑南诗稿》。临川郡斋宝祐四年（1256）刻《密斋笔记》五卷续一卷，绍兴四年（1134）刻《临川集》一百卷。寻阳郡斋庆元六年（1200）刻《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解》。庐陵郡斋宝祐元年（1253）刻《皇朝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宜春郡斋嘉定四年（1211）刻《唐摭言》十五卷，绍兴三十年（1160）刻《文标集》三卷。章贡郡斋嘉定五年（1212）刻《容斋随笔》，嘉定六年（1213）刻《楚辞集注》。赣州郡斋绍兴三十一年（1161）刻《古灵先生集》二十五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南康郡斋淳熙十一年（1184）刻《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绍熙三年（1192）刻《陶渊明集》一卷。鄱阳郡斋乾道三年（1167）刻《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嘉定十六年（1223）与会稽郡斋合刻《唐人万首绝句》一百零一卷。筠阳郡斋淳熙六年（1176）刻《栾城集》八十四卷，嘉泰元年（1201）刻《宝晋山林集拾遗》。

郡庠本

赣州郡庠刻《埤雅》二十卷。庐陵郡庠淳祐四年（1244）刻《东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续别集八卷。

郡学本

豫章郡学刻《语孟集义》三十四卷。

州（军）学本

抚州州学绍兴二十二年（1152）刻《竹友集》十卷（与《谢幼槃集》同书异名）。赣州州学刻《文选注》六十卷。建昌军学乾道元年（1165）刻《演山集》六十卷，庆元六年（1200）刻《乐书》二百卷。抚州军学淳熙二年（1175）刻《谢幼槃集》十

卷。兴国军学嘉定九年（1216）刻递修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附陆德明音义五卷。临江军学绍定六年（1233）刻《朱文公校正昌黎先生集》四十卷。临川军学端平元年（1234）刻《春秋集注》十一卷。袁州军学淳祐三年（1243）刻《春秋分纪》九十卷附例要，《汉书》一百二十卷。

县斋本

高安县斋嘉定十四年（1221）刻《帝学》八卷。大庾县斋端平元年（1234）刻《政经》一卷。

县学本

萍乡县学开禧三年（1207）刻《春秋繁露》。

（4）民间刻书

民间刻书介于官、私刻书之间，一般指寺院、道观、祠堂等以募捐或家族积累等方式投资所刻的书。民间刻书起源很早，在推动我国雕版印刷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江西各方面情况推知其宋代民间刻书同样有相当发展，可惜年代久远，能传至今日的仅有嘉定十年（1217）南康道院所刻的《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宋）朱熹撰 门人黄榦续

（5）私人刻书

两宋时，雕版印刷事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私人刻书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私人刻书指私人出资刊刻，出版归私人所有的刻本。又可分为家刻与坊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都由私人出资，故同属私刻范畴，其实存在许多差别。

家刻本，包括私宅、家塾、书塾等本。其目的为满足私家阅读或藏书之需，并不以营利为本，偶有出售也只是收回成本而已。家塾本主要是为家塾子弟提供课本或相关读物。私宅本则多为刊行本人或祖先的著述，以使名垂千古，流芳百世，有时也刻印古人名家之作或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借此显赫扬名，抬高身价。家刻主持者除少数附庸风雅的大商富贾，往往本人就是文人学

者，他们学识渊博，态度严谨，在个人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十分重视刻书内容的选择与装帧的完美，故家刻亦多善本。家刻为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赖以流传。江西家刻最有名的是吉安周必大家，在庆元二年（1196）至开禧二年（1206）短短的十年间就刻印完成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与《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三大部书皆写刻精湛，世称“庐陵三绝”。其中尤以《文苑英华》著称，历时四年以千卷的宏篇巨帙自始至终特选王思恭一人手写上版，实为难得，也表明了周氏刻版印书的水平以及对刻书质量的高度重视。此外，九江吴革咸淳元年（1265）所刻《周易本义》十二卷也很有名，其书半页仅六行，正所谓字大若钱，行格疏朗，令人赏心悦目。其他见诸记载的江西家刻本还有祝太傅宅嘉熙三年（1239）刻《方輿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一卷，鄱阳洪迈刻《灵溪集》七集，庐山严用和宝祐元年（1267）自编自刻医书《严氏济生方》十卷，萍乡赵崇恩刻《家礼》五卷，吉州东冈刘宅梅溪书院淳熙十四年（1187）刻《庐陵先生集》五十卷，庐陵赵希琴刻《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五十九卷，郑寅刻《东莱吕紫微杂说》一卷诗友杂志一卷诗话一卷，庐陵处士张祥刻《文山集》二十一卷，建昌陈东刻《续元丰类稿》四十卷以及饶州德兴县庄谿董应梦集古堂绍兴三十年（1160）刻《重广眉山三苏先生集》等十二家十四种。

坊刻本，是以雕版刻书为业的手工作坊所刻的书。印刷作坊最早出现于唐中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宋代，其规模、数量及分布区域都有很大变化，刊刻内容也从历书、字书等民俗读物扩展到经史、医书、文集无所不包。坊刻旨在营利，故多校勘不精，甚至粗制滥造，历来不被世人看重。但也有的作坊主人对刻版比较精通，具有一定的印刷技艺，或者本人就能从事编校，因此坊刻中也有一些刻印上乘的佳作。宋代刻版印书的作坊集中于

福建、浙江两地。而江西的不少城镇都曾当时的繁华之地，那里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可想而知，其雕版印刷的作坊也不会寥寥无几，并且许多有关论著对此做了充分肯定，只是具体记载太少，仅知有临江府新喻吾氏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

根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宋代江西地区的各类官刻书达120余种，包括经部39种，史部17种，子部28种，集部49种。民间刻书经部1种。私刻共15种，有家刻14种，即经、史各1种，子部4种，集部8种，还有坊刻子书1种。总计官私刻书137种。就数量而言，居浙江、四川、福建之后；就内容而言，以正经、正史、文集居多，其次为子部医书、儒学等；就质量而论，其雕版、印纸、用墨等可与浙本、蜀本媲美，较之闽刻则是更胜一筹。如上种种，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代江西刻书的大体情况。

江西刻书历史源远流长，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与李致忠先生《唐代刻书考述》两文所述，早在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江西就有雁门人纥干象雕印道家著作《刘宏传》数千本寄赠京城等地人士，表明其时江西刻书已具备了一定基础。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其刻书机构趋于完备系统，刻工队伍日益壮大，刊刻内容更为丰富，刻印质量大幅度提高，从而标志江西刻书已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宋代江西刻本中，留存至今的还有一些传世最早的刻本、初刻初印本甚至海内外孤本，就更显难能可贵。宋代江西刻书对我国雕版刻书事业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的确有着重要贡献。因所知见及水平有限，本文所述远不能概括宋代江西刻书之全貌，谨请指正。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